

中国企业管理模式

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演进机制

段海霞, 高崇尧, 苏晓华

(暨南大学 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摘要: 社会企业是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基于制度理论视角,选取残友集团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演进过程。研究发现,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企业在情境因素影响下,通过差异化的制度发展模式,形成不同的多重制度逻辑。制度背景和个体特征使初创阶段的社会企业通过制度同化,形成政府逻辑和公益逻辑;符号表征与组织实践矛盾使成长阶段的社会企业通过制度细化,形成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制度变迁和组织变革使融合阶段的社会企业通过制度扩散,形成公益逻辑、市场逻辑和合作逻辑。研究结论可为中国社会企业制度逻辑理论与实践提供新启示。

关键词: 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制度驱动因素;制度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 F272.2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7511/JMCS20240401

0 引言

国内外的社会企业正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1],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2]。发展至今,社会企业已经涉及社区照顾、扶贫济困、医疗卫生与健康、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公平、就业促进等诸多领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3]。作为理论研究对象,尽管社会企业概念界定的侧重点各不相同^[4-5],但关于社会企业组织属性的理解基本达成了一致^[6-7],即社会企业主张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融合了市场逻辑和公益逻辑的混合组织形式^[8]。然而,在多方制度主体的制度压力下^[9],许多社会企业难以协调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矛盾,存在较大的风险^[10]。因此,社会企业如何平衡多重制度逻辑以适应外部环境并实现成长,成为该研究领域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前,既有研究主要从社会企业的制度逻辑

特征、行动策略、治理模式、影响结果等方面来回答上述问题^[11-19]。从制度逻辑特征上看,社会企业往往需要完成社会使命、实现自我维持及满足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期望^[11],呈现出多重制度逻辑的典型特征^[8,12],同时具有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社会企业表现出较高的存活率和成长性^[13]。从行动策略上看,社会企业通过开展谈判行动来应对社会变革的道德复杂性^[14],并利用混合逻辑策略推进社会创业^[15],这不仅有助于平衡组织内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10]。从治理模式上看,社会企业的治理体系不仅需要遵循利益相关者的多重制度逻辑,更需要考察影响其双重目标实现的悖论机制、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等^[16],因此,社会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层次分化、优化治理机制等途径互补与兼容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制度逻辑^[17],避免企业社会使命漂移^[18]。从影响结果上看,具有社会创业导向和双重逻辑的社会企业能够通过跨界搜索

收稿日期: 2022-11-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制度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创业:从诱发到实现”(71872074)

作者简介: 段海霞,女,湖南郴州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创业与技术创新;高崇尧,男,台湾台北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苏晓华,通讯作者,女,陕西西安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 E-mail: sara. su@163.com。

满足自身异质性资源需求,从而实现双元绩效^[19]。

已有研究成果有助于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企业的多重制度逻辑,却未能对资源和制度环境约束下社会企业的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未能从动态视角探究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演进过程^[20]。尽管已有研究发现社会企业能够将政府、社会和市场的规制、规范等制度要素转化为创业资源,使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社会创业者之间产生高度相关性^[11],但缺乏对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的进一步解析。基于此,本文聚焦“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如何演进”这一问题,从制度理论出发,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开展纵向案例研究,试图探讨不同发展阶段下社会企业的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并构建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的动态综合模型,以期拓展并丰富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相关研究。

1 文献综述

1.1 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一种倡导利用商业和市场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和创造社会价值的组织^[21],社会企业打破了公私部门的边界,在促进弱势群体就业、振兴乡村、改善环境和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2],成为一个重要且有影响力的研究前沿^[20]。围绕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23]、影响因素^[5]、创业过程^[24]、绩效测量^[25]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大多认可社会企业是经济手段和社会目标的结合,具有混合组织属性^[6-7],并对社会企业的基本特征形成了3点共识。①社会企业具有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以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为使命^[1],以提供公益性社会服务为主要目标^[26],明确包含社会创业导向、公民自发行为、有限利润分配,主要从事带有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性质的事业^[27]。②社会企业代表了一种新型企业形态,具有商业企业的营利性^[28],主要体现为通过开展商业活动为边缘化群体服务、以创业的方式满足社会需求、创造利润并通过资本积累扩大企业规模、独立承担经济风险等^[29]。③社会企业介于传统非营利组织和商业企业之间,具有社会公益与市场经济的混合特性^[30-31],旨

在平衡经济效益、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14]。此外,Alter认为这种混合性还表现为社会创业者保持使命引导和市场驱动、运用商业手段达到社会目标、创造双重价值等方面^[32]。尽管现有关于社会企业组织属性的文献较为丰富,但仍缺少对资源和制度环境约束下社会企业不同属性生成和演进机制的关注和研究。

1.2 制度逻辑

制度逻辑是指某一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机制,诱发和塑造了该领域中相应的行为方式^[33]。基于该定义,桑顿等进一步将制度逻辑解释为一种由社会所构建的关于实践、假设、价值观、信念和规则的历史模式,认为制度逻辑是构成一个领域中个体行为和组织规范的具体实践和符号结构,能够赋予社会现实意义^[34]。制度逻辑遵循比较分析的框架,有助于人们理解制度机制如何决定行动者的选择^[35],逐渐成为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焦点。目前,关于制度逻辑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和发展模式等方面。

具体而言,同一制度环境中的所有组织都处于细分的制度逻辑中^[9],这些不同类型的制度逻辑共同构成了特定的组织场域,如国企改革涉及国家对资源控制的逻辑、公共资源分配的逻辑、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等^[33],因此组织是一个多重制度逻辑的混合体^[36]。通常情况下,这些制度逻辑是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但从长远来看也存在互补与兼容的可能^[37],这种可能性主要受到制度环境、组织状况和个体特征等因素的影响^[38]。其中,个体资源禀赋和外部的关键事件为组织场域内制度逻辑的形成提供了机会^[39];符号表征与组织实践之间的矛盾使组织场域中的行动者感知到多重制度逻辑存在的冲突,进而有针对性地调动社会网络资源加以解决^[40];组织场域内外部环境变化则影响了行动者的叙事方式和意义构建,促使制度逻辑在新的场域得到激活^[41-42]。此外,Thornton等创造出制度同化、制度细化和制度扩散三种模式来描述组织平衡多重制度逻辑冲突的过程^[34],即行动者在面临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多元化制度环境时会发挥主观能动性^[10],通过选择不同的制度发展模式整合相互冲突的制度逻

辑^[17]。总的来说,现有制度逻辑研究有助于分析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

1.3 社会企业的制度逻辑

结合上述关于制度逻辑概念的研究,社会企业的制度逻辑可以定义为社会企业在运作过程中所遵循的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在日益复杂的经济和制度背景下,谋求稳定发展的社会企业需要积极回应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因此,不同类型的制度逻辑将指导社会企业的行为决策和组织演化^[43]。为了探究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社会企业的期望与诉求,刘志阳和许莉萍^[44]将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划分为国家逻辑、专家逻辑、职业逻辑和社区逻辑,而更多相关研究则主要从公益逻辑、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和合作逻辑等角度对社会企业制度逻辑进行细分。

大部分相关研究认可社会企业内部包含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逻辑: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45]。公益逻辑是指社会企业创造社会价值、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创新与变革的逻辑,强调民主、自治,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10]。市场逻辑是指社会企业通过商业化、市场化运作方式获得经济回报的逻辑,强调效率、遵循市场规律,追求利润最大化^[30,46]。在中国情境下,社会企业还会受到政府逻辑影响^[47]。政府逻辑是指社会企业参与跨部门合作协调社会资源、优化制度“空洞”和“虚置”的逻辑^[48],强调规则、程序^[49],追求公共服务效果最大化。此外,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社会企业还需要嵌入多种社会网络,通过合作获得关键性资源^[44]。这种合作逻辑属于非正式制度逻辑,指的是社会企业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信息,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加大企业内外部合作力度^[50],强调共同信念和行动,追求社会大众的理解、认可和支持。虽然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理解不同类型社会企业制度逻辑的内涵^[51],但关于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如何演进的问题仍有待探讨。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企业、制度逻辑及社会企业制度逻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从组织层面探讨影响社会企业制度逻辑的前因,缺乏

从包含环境与个体层面的整合视角来分析影响社会企业制度逻辑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既有文献未能清晰解释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如何演进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是理解社会企业平衡多重制度逻辑冲突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试图基于制度理论视角,通过梳理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原因、策略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以期揭示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演进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单案例研究方法的原因有3点:①案例研究注重回答“如何”“过程”“机制”等问题,能够对现象及其所处情境进行丰富描述^[52],有助于解释“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如何演进”的问题。②由于演进过程存在多阶段、多参与主体等特点,单案例纵向研究有利于从“过程”视角厘清不同发展阶段下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产生的条件、策略及结果。③纵向案例研究能够按照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发生的时间顺序对所涉及的关键事件进行复盘与逻辑推理,有助于识别出本文所关注的制度逻辑演进触发条件和行动策略,同时深化对演进背后原因的理论解释,达到理论建构的目的。

2.2 案例选择

本文遵循典型性原则进行案例选择,以深圳市残友集团(简称残友集团)为研究对象,有3个主要原因:①由郑卫宁于1997年创办的残友集团坚守“让每个残疾人有尊严并快乐地活着”的信念,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是一家发展历史久、组织规模大、社会影响力强的社会企业,具有典型的商业经营和社会福利特征。②残友集团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进程中,不仅探索出了一条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相互融合的演进路径,还理性地选择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逐渐形成一个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生态体系,其制度逻辑演进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③残友集团目前已拥有一家慈善基金会、十四家社会组织、四十家社会企业和两家上市公司,业务涉及软件、动漫、电子商务、电子产品组装与培训等领域,员工超过5000名,其中约90%是残疾人,是一个成功的中国社会企业。

此外,本文通过梳理残友集团发展脉络,识别关键事件,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初创阶段(1997—2004年)、成长阶段(2005—2010年)和融合阶段(2011—2024年),如图1所示。本文对残友集团进行阶段划分的逻辑:不同发展阶段下,制度环境特征、组织资源状况及社会创业者所展现的个体特征都存在差异^[53],社会企业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会形成不同的制度逻辑,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残友集团各阶段的关键点不同:①初创阶段,社会企业的创业者结

合外部制度环境及自身资源禀赋进行社会创业,主要任务是实现社会公益和公共服务的目标;②成长阶段,社会企业借助商业手段可以缓解成长资金压力与公益目标、政府目标冲突的问题,实现健康成长;③融合阶段,社会企业在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了组织变革,并将企业成功的发展经验和经营模式融入相关的其他场域中,构建了一个可以连接更广泛利益相关者的生态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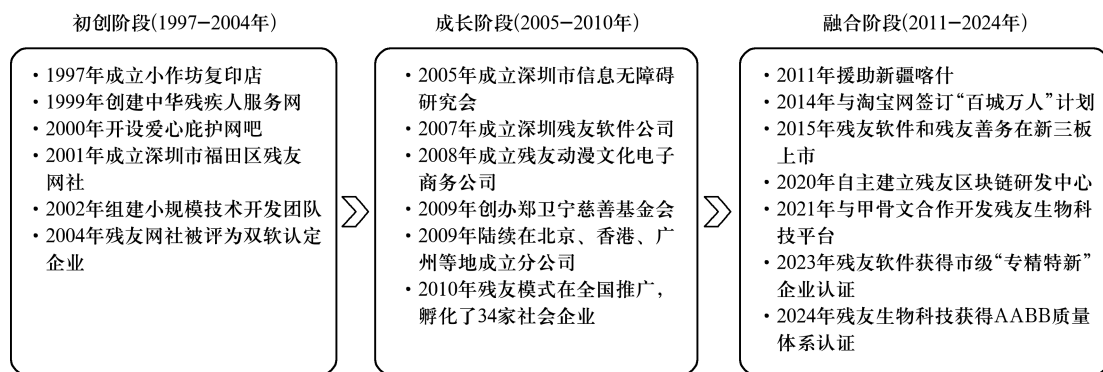


图1 残友集团发展历程及关键事件

Fig. 1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key events of Canyou Group

2.3 数据收集

残友集团自成立以来,其理念、发展和影响力等方面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关残友集团可持续发展的资料和研究文献十分丰富,相关报道、访谈记录、调研材料、学术文献较易获取。此外,只要收集的二手数据具有逻辑性,适合回答研究问题而且数据量足够充分,就可以作为案例分析的数据来源^[54-55]。为了提高单案例研究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三角测量法,通过多数数据来源收集大量二手资料,并通过实地调研补充一些一手资料,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54]。

首先,浏览报刊和残友集团官方网站,在网络上收集了78篇关于残友集团的新闻报道,并在官方网站中收集了58篇与企业发展相关的文章。其次,查阅知网的文献资料库,收集了与残友集团相关的12篇学位论文和34篇期刊论文。再次,观看网络视频报道,收集了36个与残友集团相关的视频,并将其内容摘编成文档。最后,团队成员通过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一手资料,访谈转录文本约1.3万字。数据收集来源见表1。

表1 数据收集来源

Tab. 1 Data collection sources

资料类型	资料来源	资料数量
访谈资料	深圳市残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喀什残友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共约1.3万字
	郑卫宁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残友集团中层管理者	
	残友集团员工	

(续表)

资料类型	资料来源	资料数量
文字资料	残友集团相关新闻	78篇(4.8万字)
	残友集团官方网站文章	58篇(3.2万字)
	学位论文	12篇(30.7万字)
	期刊论文	34篇(36.8万字)
视频资料	《创业讲坛视频:中国著名残疾人社会企业深圳残友集团案例分享》 《残友故事——深圳市残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郑卫宁深圳残友集团宣传视频》 《残友领袖——郑卫宁》	36个视频(6.2万字)

3 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具有形成新思想特点的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特别强调通过系统化的方法获取资料,并通过资料与理论之间的反复对话来归纳和构建新的理论模型,进而解释现象背后的规律。因此,本文通过多渠道系统地收集案例企业的新闻报道、官方资讯、期刊论文和宣传视频等二手资料,并补充了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的核心概念,通过逐级编码归纳范畴和主范畴,按照“条件/原因—行动策略—结果”的关系逻辑提炼故事线,以解析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进而构建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的动态综合模型。

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一个密集地收集资料认识现象,并对资料加以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具体的操作如下:①按照案例企业发展阶段进行编码,根据各阶段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依次将其初

创阶段、成长阶段和融合阶段编码为S、G、I^①。②逐句、逐段地标签化案例企业初创阶段的资料,归纳出概念,并将具有相关性的概念范畴化。③时刻关注与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原因、行动策略和结果有关的信息。④通过编码,对案例企业成长阶段和融合阶段的资料按照相同的流程进行开放式编码,继续形成、扩充和修订概念和范畴。⑤当全部资料都完成开放式编码流程,将得到稳定的概念和范畴。最终,本文共得到155个概念和13个范畴,开放式编码示例见表2。

3.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目的是发现、建立概念与范畴之间的关系,并从范畴中归纳出主范畴,使概念与范畴、主范畴之间能够对话,进而把分散的资料以新方式联系起来。本文通过反复比较开放式编码所得到的13个范畴,进一步归纳和提炼具有相关性的范畴,得到制度驱动因素、制度发展模式和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3个主范畴(表3)。

表2 社会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开放式编码示例

Tab. 2 Examples of the open coding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编码	标签化 案例典型资料记载	概念化		范畴化	
		概念	编码	范畴	编码
S2	深圳特区紧邻香港,可以获得关于社会企业等的新思想	政治区域优势	IB2	制度背景	IB
S3	残友集团诞生于中国传统福利企业的转型阶段	企业制度转型期	IB6		

① 初创阶段的英文是 Start-up stage, 缩写为 S; 成长阶段的英文是 Growth stage, 缩写为 G; 融合阶段的英文是 Integration stage, 缩写为 I。

(续表)

标签化		概念化		范畴化	
编码	案例典型资料记载	概念	编码	范畴	编码
S4	在妻子的支持下,郑卫宁有了换个活法的想法,想要人生过得更有意义。	家庭情感支持 自我实现动机	IC2 IC3	个体特征	IC
S4	郑卫宁参加诺基亚总裁关于互联网的一场讲座,深刻意识到互联网对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机会,他想通过互联网使更多残疾人能够自力更生	创业警觉性高 社会创业动机	IC7 IC8		
G2	残友集团总部挂着张海迪的题字“越是残疾,越要美丽”	抽象理想信念	SR3	符号表征	SR
G8	为了应对政府的审计,残友集团整理发票就投入了 800 多万元,至今每个月还要给喀什残友补助 7 万多元	财务负担沉重 补助开支巨大	OP5 OP6	组织实践	OP
G9	爱心庇护网吧也陷入了经营困境	企业经营困难	OP8		
I3	方兴未艾的社会企业掀起了一场社会慈善事业的革命,中国慈善机构领军人物和学界的专家也开始重视社会企业	慈善事业革命 社会企业文化兴起	IT5 IT6	制度变迁	IT
I6	残友集团打造的是“三位一体”组织架构,郑卫宁慈善基金会整合社会公益资源打造平台	组织架构调整 构建组织网络	OC1 OC2	组织变革	OC
I8	残友新平台做得特别好,吸引了腾讯的技术骨干加入	优化人员配备	OC8		
S12	残友集团认为员工做人的标准要遵循社会公民的标准	遵循社会标准	IA6	制度同化	IA
S13	残友集团的工资标准与其他企业无异	统一企业薪资	IA7		
G12	援疆的财务压力使残友集团不再继续开展纯公益,提出依托各 IT 巨头使残疾人利用电脑就业的“百城万人”计划	转换公益模式 深化发展思路	IR6 IR7	制度细化	IR
I12	郑卫宁带领残友集团走总部经济之路,在全国多个城市复制残友模式,从 2009 年开始陆续成立分公司	复制企业经营模式 共享企业发展经验	ID1 ID2	制度扩散	ID
I18	残友集团的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已走向了全国	推广企业发展模式	ID10		
S15	成立喀什残友,帮助当地政府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	社会治理手段	GL2	政府逻辑	GL
S16	福田区政府为残友集团提供了优惠的建设土地	得到政府支持	GL9		
S17	残友集团在援疆过程中解决了 227 个少数民族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提供就业机会 赋能特殊群体	CL1 CL2	公益逻辑	CL
G20	相继有 26 名大学生加入残友集团的残友社	吸引公众参与	CL17		
I21	残友的员工都能在小社区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能力	社区公民自治	CL20		
G21	残友集团想要运用商业手段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就必须为客户提供很好的、高附加值的产品	商业化运营 客户导向	ML1 ML2	市场逻辑	ML
I26	残友集团研发的“信息无障碍阅读”是一项全新技术	持续技术创新	ML16		
I30	残友集团联合各方力量共同解决残疾人就业等社会问题	解决方案合作	PL6		
I31	郑卫宁参加美国加州大学的“全球华人慈善国际研讨会”	学术合作	PL10	合作逻辑	PL
I34	残友集团形成了良性发展的闭环的公益生态圈	构建公益生态圈	PL14		

注:案例典型资料记载的编码符号 Xn 中,X 表示案例社会企业发展阶段,n 表示该阶段资料记载中第 n 个编码片段,如 S1 指初创阶段资料记载中的第 1 个编码片段。概念编码符号 XYn 或 XYZn 中,XY 或 XYZ 表示范畴英文词组首字母缩写,n 表示概念编码序号,如 IB1 指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制度背景)的第 1 个概念编码。

表3 主轴式编码形成的关系内涵与主范畴
Tab.3 The relational connotations and main categories formed by axial coding

主范畴	范畴	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内涵
制度驱动因素	制度背景	社会企业当时所处的政治制度、组织制度和文化认知等制度环境状况
	个体特征	社会创业者所特有的认知、态度、动机、知识、能力、关系等特质和资源
	符号表征	社会企业为了构建意义而用符号、标语或口号代表某一事物,形成了新叙事
	组织实践	社会企业在能动地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所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及面临的困境
	制度变迁	产生新的关于社会企业与特殊群体的政策、规范、文化认知等制度环境
	组织变革	社会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及时调整、改进和革新组织管理理念、工作方式、组织结构、人员配备、组织文化及技术等要素
制度发展模式	制度同化	将社会其他组织的观念、行动逻辑元素纳入社会企业行动逻辑
	制度细化	社会企业在成长中引入新的实践经验、经营模式,进一步强化了其行动逻辑
	制度扩散	将社会企业成功的发展经验、经营模式与行动逻辑扩散到相关的组织场域中
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	政府逻辑	做好公共服务与提升政府绩效,目标是谋求社会福利
	公益逻辑	强调解决社会问题与实现社会价值,目的是满足特殊群体利益需求
	市场逻辑	主张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遵循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
	合作逻辑	积极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加大企业内外部合作力度,以获得认知、市场和政治合法性

3.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指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范畴和主范畴当中,选择或提炼出一个核心范畴,利用“故事线”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概括,进而建立分析框架。本文综合分析已发掘的13个范畴和3个主范畴,进一步提炼出“社

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其故事线可以描述为:在不同的资源和制度环境影响下,社会企业会趋向于选择不同的制度发展模式,结果形成差异化的多重制度逻辑。基于该故事线,本文构建出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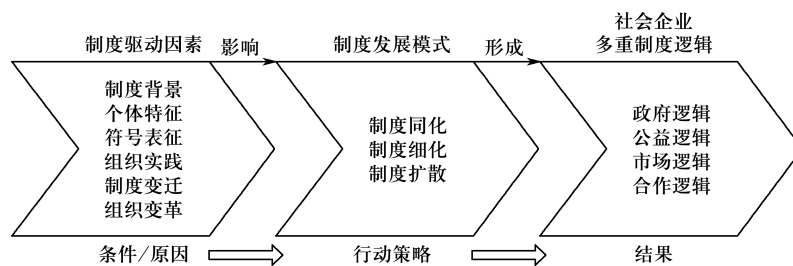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的分析框架

Fig.2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the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social enterprises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当继续收集的资料不能再产生新的概念和范畴,也不能增加主范畴的新类属时,文章所构建的理论便达到了理论饱和^[56]。为了检验表3中的概念、范畴和主范畴是否达到理论饱和,本文继续扎根编码其他二手资料。结果表明,本

文所归纳的概念和范畴已基本完善,未涌现关于构建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3个主范畴(制度驱动因素、制度发展模式和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新类属,由此判断本文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

4 研究发现

本文以残友集团为研究案例,首先,分析案例企业初创阶段的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其次,按照相同程序分析其成长阶段和融合阶段,最后,结合案例分析结果归纳出相应的研究命题。

4.1 初创阶段:政府逻辑和公益逻辑的形成

编码结果显示,社会企业在创立初期主要受外部制度背景和社会创业者个体特征的影响。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社会企业将社会中盛行的观念、经验和行动规范合并到自身创业活动中,进而形成独特的行为方式和处事准则。如在残友集团的初创阶段,身体残疾的郑卫宁很早就接触并践行社会企业理念,通过整合互联网平台优势和自有资源开展社会创业,在重构企业价值过程中达成了政府目标,并承担了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制度背景和个体特征使初创阶段的社会企业趋向于制度同化,形成了政府逻辑和公益逻辑。

具体而言,制度背景是指社会企业当时所处的政治制度、组织制度和文化认知等制度环境状况,而个体特征资源是指社会创业者所特有的认知、态度、动机、知识、能力、关系等特质和资源^[38]。本文通过编码案例资料发现,在社会企业初创阶段,具有较高创业警觉性的社会创业者会充分借用外部政治区域优势、盛行的组织理念及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并主动学习新的组织管理知识与技能,将新颖的组织制度和技术方案纳入社会创业活动中。此外,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社会创业者还会主动接纳特殊群体,利用新技术帮助他们在社会企业中开展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进而使得大众关注并认可特殊群体。在借助组织场域外部制度力量过程中,社会创业者坚定为社会服务的动机,通过资源拼凑等方式建立符合社会企业标准的组织形式,使社会企业在帮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增强自身公益服务能力。

从残友集团的案例实践来看,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因为深圳经济特区地理位置紧邻香港(1B2),诸如互联网、公益慈善、社会企业等新理念第一时间进入深圳(1B1)。当时在深圳的

郑卫宁敏锐地察觉到(1C7),中国即将进入传统福利企业的转型期和创新期(1B6),他想抓住这个机会摆脱残疾人以往的生活模式,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1C3)。郑卫宁认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残疾人的身体缺陷逐渐被忽略(1A3),残疾人也可以借助高科技实现就业(1A4)。因此,在1999年参加了一场诺基亚总裁关于互联网发展的讲座后,郑卫宁深刻地意识到互联网是残疾人参与就业和创业的机会(1C7),这更加坚定他通过互联网平台使更多残疾人实现自力更生的想法(1C8)。

于是,郑卫宁充分利用先前自学的中文、法律和企业管理等专业知识(1C5),以及母亲留下来的30万元现金和一处房子(1C6),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社会创业活动。1997年,郑卫宁带领5个残疾人朋友在家用一台电脑成立了小作坊复印店(CL3),随后又在1999年创立了提供残疾人政策和生活信息服务的中华残疾人服务网(CL4)。2001年,他们成立了爱心庇护网吧,专门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CL7);2002年,他们启动了为残疾人提供免费电脑培训的项目,让残疾人多了一技之长(CL8)。从1997年开始,郑卫宁与他的同伴们一直在社会创业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行,通过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重构残疾人的人力资本(1A2),使残疾人能够更有尊严、更快乐地生活下去(1A4),同时也为改善中国公共服务水平(GL6)、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GL2)贡献力量。

以上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初创阶段的社会企业在制度背景和社会创业者个人特征的影响下,通过技术赋能特殊群体,不仅重构了人们对特殊群体的认知,还使特殊群体有能力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该阶段的社会企业既达成了政府的公共服务目标,又解决了特殊群体的就业难题,形成了政府逻辑和公益逻辑。初创阶段的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形成机制如图3所示。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本文提出新命题:

命题1:在初创阶段,制度背景和个体特征使社会企业通过制度同化形成政府逻辑和公益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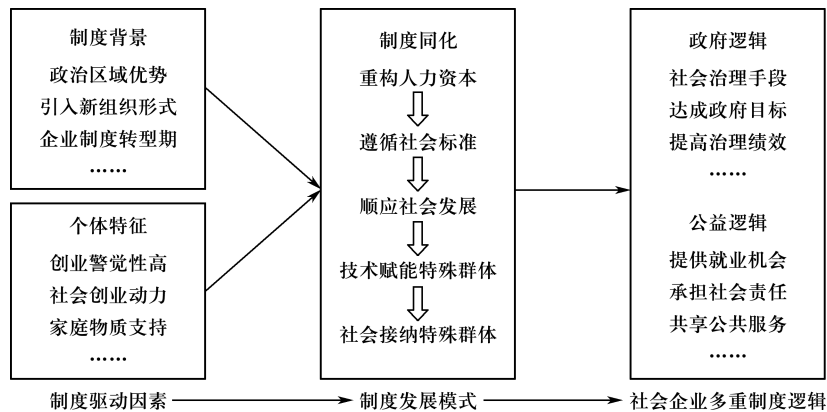


图3 初创阶段的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形成机制

Fig. 3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start-up stage

4.2 成长阶段: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形成

编码结果显示,步入成长阶段的社会企业在原先政府逻辑和公益逻辑指导下陷入了盈利能力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弱、高素质人才匮乏、市场竞争力低下等发展困境。为了摆脱困境,社会企业引入市场化经营模式,在强化内生性公益逻辑的同时形成了市场逻辑。例如,成长阶段的残友集团在践行政府逻辑和公益逻辑过程中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难以保障员工福利和维持公司经营,对此残友集团采用商业手段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在继续开展慈善事业的同时创新商业模式,扩大经营范围。由此可见,符号特征和组织实践矛盾使成长阶段的社会企业趋向于制度细化,兼顾了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

具体而言,符号特征是指社会企业为了构建意义而用符号、标语或口号代表某一事物,形成了新叙事;而组织实践是指社会企业在能动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所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及面临的困境^[40]。通过编码案例资料发现,社会企业在成长阶段会通过叙事或修辞方式宣传其使命或文化,但这些行为策略并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导致遵循先前制度逻辑指导的社会企业面临难以平衡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等诸多实际难题。为了缓解这些符号表征与组织实践之间的冲突,社会企业会转变公益发展模式,注重培养竞争意识和商业思维,在优化公益服务的过程中开发商业机会。此外,社会企业还会在洞悉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优质、高附加值的产品,以实现可持

续发展。

这在残友集团的案例中有所体现。残友集团总部大厅悬挂着诸如“工作对于残疾人士而言,解决的不仅是一个生存问题,更是尊严问题”“残疾人士可以利用互联网成为更优质的人力资源”“越是残疾,越要美丽”等标语(SR3),并在招聘时宣传“让所有参加残友集团的残疾人过一种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等口号(SR9),这些叙事方式彰显了残友集团坚定为残疾人服务和赋能的决心(SR1)。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此时的残友集团却面临援疆开销负担过大(OP6)、爱心庇护网吧因竞争力弱(OP7)而经营困难(OP8)、支撑不了庞大的员工医疗费用(OP10)、难以保障丧失工作能力的员工福利(OP11)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坚守企业社会使命,残友集团决定转变纯公益服务模式(IR6),提出依托IT巨头使残疾人利用电脑就业的“百城万人”计划(IR7),并与其他商业企业一样采用竞标项目的方式参加商业活动(IR9),不再开展免费项目(IR10)。

为了更加深入地践行社会企业的公益使命,残友集团在2005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无障碍信息研究会(CL13),并且为员工提供免费餐食住宿(CL14)和无障碍设施(CL15),还建立了专属生病员工的退养机制等(CL14)。同时,残友集团加强与外部社会组织、商业企业与个体的合作,相继吸引了26名大学生加入残友社(CL17)。在商业活动方面,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残友集团从2006年起加大了对高校毕业生的招聘力度,利用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源优势

(ML3),在全国设立了多个分公司(ML4)。随后,残友集团在2007年成立专门招聘理工专业残疾人的残友软件公司(ML8),在2008年又成立了残友动漫文化及电子商务公司,以满足青年人对漫画和网购的需求(ML10)。在探索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残友集团逐步拥有多种组织形态(ML4),从传统非营利组织转变为能够自负盈亏的营利性社会企业(ML7),构建了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以上案例分析结果表明,成长阶段的社会企业为了解决“输血式帮扶”符号表征和“强化造血功能”组织实践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不断加大公益事业投入力度并吸引公众广泛参与,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商业化项目。该阶段的社会企业既确保了其社会使命不漂移,又强化了自我造血能力,还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成长阶段的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形成机制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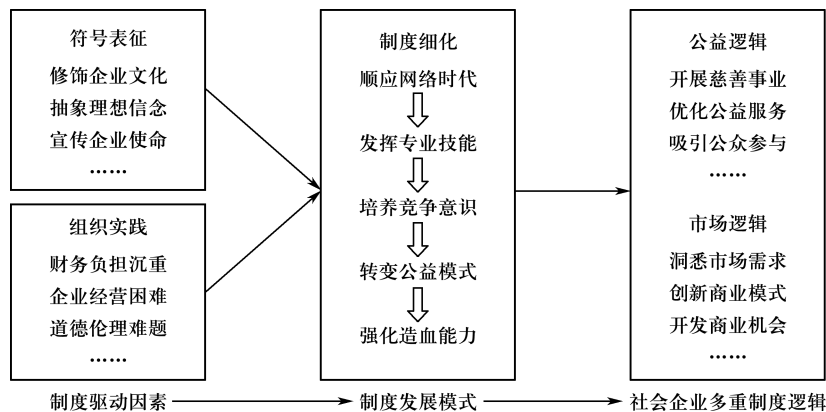


Fig. 4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social enterprise in the growth stage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本文提出新命题:

命题2:在成长阶段,符号表征和组织实践矛盾使社会企业通过制度细化形成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

4.3 融合阶段:公益逻辑、市场逻辑和合作逻辑的形成

编码结果显示,融合阶段的社会企业会对外部制度环境变化做出敏捷的反应,及时调整组织战略、组织架构和经营理念。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社会企业会顺应政府政策的发展大势,接纳并尝试新鲜事物,通过发展具有灵活性的组织形式,将自身成功的实践经验扩散到与之相关的组织场域中,强化企业内外部合作力度,进而在巩固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例如,融合阶段的残友集团察觉到政府和社会对残疾人的高度重视,于是开始打造一个利益相关者更广泛的公益生态圈,并与生态圈成员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由此可见,制度变迁和组织变革使融合阶段的社会企业趋向于制度扩散,形成了公益逻辑、市

场逻辑和合作逻辑。

具体而言,制度变迁是指产生新的关于社会企业与特殊群体的政策、规范、文化认知等制度环境^[42],而组织变革是指社会企业根据内外外部环境及时调整、改进和革新组织管理理念、工作方式、组织架构、人员配备、组织文化及技术等要素^[41]。本文通过编码案例资料发现,社会企业在融合阶段会时刻关注政策导向、组织规范、大众认知等制度变迁。当发现政府加大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力度、慈善事业兴起、数字技术发展等现象时,社会企业会迅速通过组织变革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通过合作扩大其公益事业规模和商业活动范围,从而将原有的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融入与之相关的其他组织场域中,以获得认知、市场和政治合法性,最终形成了新的多重制度逻辑。通过扩散企业经营模式、共享企业发展经验和提供企业履责样板,融合阶段的社会企业不仅改变了社会理念,还推动了社会创新和社会变革。

正如残友集团案例所示,近年来中国地方

政府重视残疾人的教育及就业(IT1),群众也高度关注残疾人的生活与发展(IT2),中国一些慈善机构的领军人物及行业专家也呼唤人们关注社会企业的培育和成长(IT7),因此,残友集团抓住发展机遇来进一步拓展组织边界(PL1),构建了“三位一体”组织架构(OC1),并通过基金会整合社会公益资源打造平台(OC2),保证了残友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始终坚持社会企业的发展方向(OC4)。此外,残友集团尝试推行合伙人制度(OC6),不仅吸引了腾讯的技术骨干加入(OC8),还形成了独特的“残友社会企业孵化模式”(OC9)。为了推广残友集团的成功发展经验并造福更多残疾人,郑卫宁带领残友集团走“总部经济”之路,在全国多个城市复制残友模式(ID1);而残友集团副董事长刘勇去喀什援疆之后,更是将残友理念完整地“复制”了过去(ID8)。发展至今,残友集团带动超过15万残疾人通过互联网间接就业(CL9),成为推动残疾人就业的标杆企业(ID6)。

在企业内部,残友集团创造性地设置了残友们的工作、生活、成长模式,将工厂办成了兼有生产、生活双重功能的小社会(CL19),使员工都能够在这个小社区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能力(CL20)。在业务方面,残友软件有限公

司用5个月的时间获得了美国软件工程学院CMMI三级标准认证(ML17),成为深圳市第11家获得认证的公司(ML15)。此外,残友集团自主研发了信息无障碍阅读等新技术(ML16),旗下的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在2021年5月还与甲骨文公司联合启动了残友生物科技平台,双方将共同开启数字化未来(ML21)。继残友软件在2023年获得深圳市“专精特新”企业认证之后,残友生物科技又于2024年获得AABB质量体系认证,这使得残友集团的服务质量在用户中形成了良好口碑(ML18),订单非常多(ML19)。总体而言,融合阶段的残友集团构建了一个良性发展的公益生态圈(PL14),成为公益慈善的一个典范(PL13),是一张社会创新的“名片”(PL5)。

以上案例分析结果表明,融合阶段的社会企业能够及时根据制度变迁进行组织变革,通过构建社会网络联合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展多元化的公益活动;同时,通过优化公司治理体系、创新组织经营模式及持续的技术创新,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成为社会企业的一个发展标杆。最后,该阶段的社会企业形成了公益逻辑、市场逻辑和合作逻辑。融合阶段的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形成机制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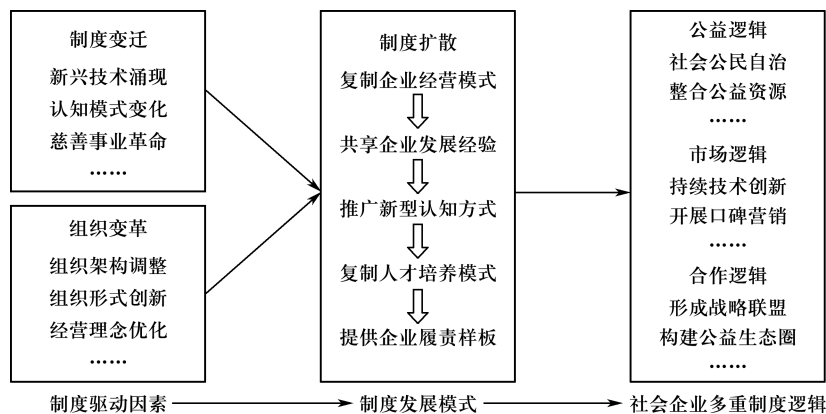


图5 融合阶段的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形成机制

Fig. 5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social enterprise in the integration stage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本文提出新命题:

命题3:在融合阶段,制度变迁和组织变革使社会企业通过制度扩散形成公益逻辑、市场逻辑和合作逻辑。

4.4 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演进机制

基于以上案例分析的结果,本文构建了制度驱动因素、制度发展模式与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动态综合模型,即在不同发展阶段的

情境因素影响下,社会企业趋向于选择差异化的制度发展模式,形成了不同组合的制度逻辑,

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的动态综合模型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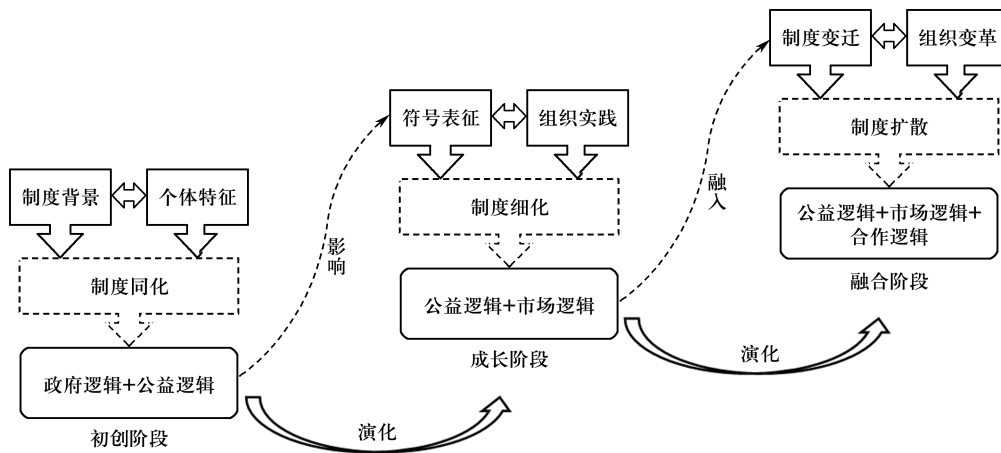


图6 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的动态综合模型

Fig. 6 A dynamic comprehensive model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social enterprises

研究表明,在制度环境、组织状况和个体特征的综合影响下,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动态演进。在初创阶段,社会企业面临复杂的制度背景及独特的社会创业者特质与资源,为了将这些宏观制度优势和微观个体资源禀赋整合到社会创业活动中,社会企业采取重构人力资本、遵循社会标准和统一企业薪资等制度同化策略,在达到政府目标的同时实现社会价值,形成了政府逻辑和公益逻辑。在成长阶段,社会企业在先前的政府逻辑和公益逻辑指导下陷入资金短缺、创新不足和竞争力低下的困境。为了解决强调公益的符号表征与必须盈利的组织实践之间的矛盾,社会企业采取转变公益模式、培养竞争意识和强化造血能力等制度细化策略,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获取经济利益,兼顾了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在融合阶段,社会企业时刻关注外部制度变迁,并主动开展灵活的组织变革,具有更强的组织韧性和适应性。通过复制经营模式、共享企业发展经验等制度扩散策略,社会企业持续拓展组织边界并构建生态圈,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参与公益事业和商业活动,在巩固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基础上融入了合作逻辑。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本文提出新命题:

命题4:社会企业在面临不同发展阶段的

影响因素时,通过有目的地选择不同的制度发展模式,协调多重制度逻辑冲突,最终形成新的制度逻辑组合。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对案例企业进行了纵向研究和数据分析,深入探究了制度驱动因素、制度发展模式和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三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并构建了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的动态综合模型。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4个部分:①初创阶段的社会企业为了整合外部制度优势和社会创业者个体资源与能力,通过重构认知、遵循标准、顺应发展等制度同化策略,在协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增强自身公益服务能力,形成政府逻辑和公益逻辑。②成长阶段的社会企业为了解决“输血式帮扶”符号表征和“强化造血功能”组织实践之间的矛盾,通过转变模式、强化能力、深化发展等制度细化策略,既优化了公益服务又提高了盈利水平,兼顾了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③融合阶段的社会企业为了顺应制度变迁而开展组织变革,通过复制模式、共享经验、推广理念等制度扩散策略,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广泛的生态圈,更好地融合了公益逻辑和

市场逻辑,并发展出合作逻辑。④面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环境、组织状况和个体特征,社会企业有目的地选择制度同化、制度细化、制度扩散策略来协调多重制度逻辑冲突,最终形成包括政府逻辑、公益逻辑、市场逻辑和合作逻辑的不同制度逻辑组合。

5.2 理论贡献

现有研究对于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类型、冲突及治理机制等取得了较多有价值的成果,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为3个方面。

第一,拓展了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的影响因素研究。既有文献关注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冲突的表现形式^[12],分析了不同类型社会企业所产生的差异化制度逻辑^[47],较少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形成和发展^[51],更缺少对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条件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先从制度环境、组织状况和个体特征的整合视角揭示了影响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的因素。再基于不同发展阶段,分析了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所面临的差异化资源环境条件,指出社会企业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而形成不同的制度逻辑组合,进一步呼应了已有研究对加强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影响因素的关注。

第二,丰富了社会企业形成多重制度逻辑的行动策略研究。既有研究发现社会企业选择制度逻辑不仅取决于社会企业所属类型的不同^[10],还取决于社会企业对合法性需求的不同^[50],尚未阐述清楚社会企业是通过何种行动策略形成差异化制度逻辑组合的,但这些行动策略对于理解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形成和合法性获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在前述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纵向案例研究进一步梳理出制度同化、制度细化和制度扩散这三种影响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形成的制度发展模式,并考虑了先前多重制度逻辑对这一过程的影响,丰富了资源和制度环境约束下社会企业形成制度逻辑的行动策略。

第三,深化了对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的理解。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实现社会企业双重目标的悖论机制、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16],或者关注管理商业逻辑和市场逻辑融合

的治理机制^[17],但这些研究都未能清晰地解释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尝试基于制度理论视角,构建了“制度驱动因素—制度发展模式—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从不同发展阶段解析了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机制。更进一步,本文研究结论既可为探究不同发展情境下的社会企业成长方向提供有效指导,又可深化制度理论和制度逻辑在社会企业研究领域的应用。

5.3 实践启示

本文探索了不同发展阶段下的社会企业如何采取差异化的制度发展模式适应动态的环境并形成不同组合的制度逻辑,研究结论对于当前蓬勃发展的社会企业的创业和经营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企业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包容性发展趋势和慈善事业发展浪潮等外部制度环境开展创业活动,并灵活地调整、改进和优化组织架构、人员配备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企业的创业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公益目标与商业目标冲突,并避免社会使命漂移等问题。

第二,无论是社会企业还是社会创业者都嵌入在多种、多层次的制度环境中,受到特定的制度逻辑约束,因此,为了突破约束、实现成长,社会创业者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时刻保持对实践的洞察力与反应力,而社会企业则应当增强从社会问题中开发商业机会的能力,通过平衡多重制度逻辑的冲突,同时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第三,本文所构建的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演进的动态综合模型,提醒社会创业者或社会创业团队不能孤立地看待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冲突问题,而应当根据社会企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有目的地采取不同的制度发展模式来应对差异化的制度驱动因素,理性地协调多重制度逻辑并明确企业发展方向。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受限于研究资源和时间,本文存在3点不足:①本文仅从理论上分析了“制度驱动因素—制度发展模式—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演进机制,未来研究可以对这些构念开发量表,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断丰富社会企业多

重制度逻辑的研究。②尽管本研究有较为丰富的二手数据相互印证,但是文中的一些结论和社会企业经营实践之间仍然有一定“距离”,一些现象难以准确概念化,还有待通过多案例分析,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准确性。③本文认为社会企业的政府逻辑、公益逻辑、市场逻辑和合作逻辑是动态变化的,但并未揭示这些制度逻辑之间冲突、兼容或相互促进的过程,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并探究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 [1] 金碚. 社会企业的机理逻辑及对认识现代市场经济的启示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3): 5-19.
- [2] 郑刚, 陈箫, 胡珊. 社会创业、合法性构建与社会企业成长——基于深圳残友集团的纵向案例研究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2, 43(1): 124-137.
- [3] Weerawardena J, Mort G S, Salunke S, et al. Editorial and research agenda: JBR special issue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social purpose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5: 592-596.
- [4] Gertner R H.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 [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3, 15: 41-62.
- [5] Canestrino R, Ćwiklicki M, Magliocca P, et al. Understand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bus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0, 110: 132-143.
- [6] Ratinho T, Bruneel J. Taking stock of research on hybrid organizations: Enrich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xtending empirical contexts, and expanding practical releva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4, 170: 114313.
- [7] Battilana J, Lee M. Advancing research on hybrid organizing: Insights from the study of social enterpris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4, 8(1): 397-441.
- [8] Pache A C, Santos F. Inside the hybrid organization: Selective coupling as a response to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J]. Journal of Academy of Management, 2013, 56(4): 972-1001.
- [9] 李宏贵, 谢蕊, 陈忠卫. 多重制度逻辑下企业创新合法化战略行为——基于阿里巴巴案例分析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 38(7): 133-144.
- [10] 许艳芳, 朱春玲. 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企业创业策略的选择——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案例研究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2, 15(1): 51-68.
- [11] 刘志阳, 许莉萍. 制度与社会创业: 基于文献的整合框架 [J]. 经济管理, 2022, 44(1): 192-208.
- [12] 葛笑春, 刘虎, 田雪莹, 等. 多重制度逻辑下组织创业资源的识取——非营利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的案例研究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1, 14(2): 192-204.
- [13] Ince I, Hahn R. How dynamic capabilities facilitate the survivability of social enterprise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sensing and seizing capacities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20, 58(6): 1256-1290.
- [14] Bhatt B. Ethical complexity of social change: Negotiated actions of a social enterprise [J/OL].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22: 1-20.
- [15] 彭伟, 于小进, 郑庆龄. 中国情境下的社会创业过程研究 [J]. 管理学报, 2019, 16(2): 229-237.
- [16] 刘志阳, 孙孟子. 社会企业治理体系: 双重目标实现的制度安排 [J]. 东南学术, 2022(2): 105-116.
- [17] 武静. 社会企业如何兼顾公益与商业——基于制度逻辑的分析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8(10): 119-128.
- [18] Ebrahim A, Battilana J, Mair J.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Mission drift and accountability challenges in hybrid organizations [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4, 34: 81-100.
- [19] 李姗姗, 黄群慧. 社会创业导向、跨界搜索与社会企业绩效: 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39(2): 60-69.
- [20] Saebi T, Foss N J, Linder 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mis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45(1): 70-95.
- [21] 黄英. 社会企业失灵了吗?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1, 43(8): 3-18.
- [22] Haugh H M, Talwar A. Link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chang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owerment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 133(4): 643-658.
- [23] Dwivedi A, Weerawardena J. Conceptualizing and operationalizing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nstruct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 2018, 86: 32-40.
- [24] Rahim H L, Mohtar 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2015, 1(1): 9-15.
- [25] Rawhouser H, Cummings M, Newbert S L. Social impact measurement: Current approach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9, 43(1): 82-115.
- [26] Dacin P A, Dacin M T, Matear M.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Why we don't need a new theory and how we move forward from her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0, 24(3): 37-57.
- [27] Cukier W, Trenholm S, Carl D, et 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content analysis [J]. *Journal of Strategic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2011, 7(1): 99-119.
- [28] Gupta P, Chauhan S, Paul J, et 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0, 113: 209-229.
- [29] Wu Y J, Wu T, Sharpe J. Consensus on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content analysis approach [J]. *Management Decision*, 2020, 58(12): 2593-2619.
- [30] Bojica A M, Martínez-Del-Río J. Framing conflicting demands and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hybridity in social enterprises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23, 35(9-10): 715-745.
- [31] 刘志阳, 邱振宇, 许莉萍, 等. 社会企业组织混合性与社会影响力的关系研究 [J]. *南开管理评论*, 2024, 27(1): 246-258.
- [32] Alter K. Social enterprise typology [J]. *Virtue Ventures LLC*, 2007, 12(1): 1-124.
- [33] 周雪光, 艾云.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 一个分析框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4): 132-150, 223.
- [34] 帕特丽夏·桑顿, 威廉·奥卡西奥, 龙思博. 制度逻辑: 制度如何塑造人和组织 [M]. 汪少卿, 杜运周, 翟慎霄, 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35] Thornton P H.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ion in a craft industry: Conflict and conformity in institutional logic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1): 81-101.
- [36] Pilon M, Mansurov A. Hybrid organizations: A classification within economic sectors [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4, 11(1): 1-7.
- [37] 肖红军, 阳镇. 共益企业: 社会责任实践的合意性组织范式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7): 174-192.
- [38] Seo M G, Creed W E 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praxi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2): 222-247.
- [39] Sine W D, David R J. Environmental jolt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cre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n the US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J]. *Research Policy*, 2003, 32(2): 185-207.
- [40] Fligstein N. Social skill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7, 40(4): 397-405.
- [41] Boxenbaum E. Lost in translation: The making of Danish diversity management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6, 49(7): 939-948.
- [42] Zilber T B. The work of the symbolic in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Translations of rational myths in Israeli high te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49(2): 281-303.
- [43] 葛笑春, 余静, 刘虎, 等. 企业社会创业的跨部门联盟匹配与价值创造——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3, 16(1): 50-61.
- [44] 刘志阳, 许莉萍. 求同还是存异: 制度理论视角的社会创业者修辞策略选择 [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0, 32(3): 1-12.
- [45] Battilana J, Sengul M, Pache A C, et al. Harnessing productive tensions in hybrid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58(6): 1658-1685.
- [46] Agarwal N, Chakrabarti R, Prabhu J C, et al. Managing dilemma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rough jugaad: A multi-method study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Indian healthcare [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20, 14(3): 419-443.
- [47] 刘玉焕, 尹珏林, 李丹. 社会企业多元制度逻辑冲突的探索性分析 [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0,

- 32(3): 13-24.
- [48] Parthiban R, Qureshi I, Bandyopadhyay S, et al. Leveraging ICT to overcome complementary institutional voids: Insights from institutional work by a social enterprise to help marginalized [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20, 22(3): 633-653.
- [49] Liu Y, Zhang C, Jing R. Coping with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temporal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work dur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one foundation in China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6, 12(2): 387-416.
- [50] 刘振, 崔连广, 杨俊, 等. 制度逻辑、合法性机制与社会企业成长 [J]. *管理学报*, 2015, 12(4): 565-575.
- [51] Schumm C Z, Niehm L S. Supplier selection at the base of the chain: Navigating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for shared mutual value [J/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 2023.
- [52] Eisenhardt K M, Graebner M E.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1), 25-32.
- [53] 陈逢文, 付龙望, 张露, 等. 创业者个体学习、组织学习如何交互影响企业创新行为? ——基于整合视角的纵向单案例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0, 36(3): 142-164.
- [54]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7.
- [55] 毛基业. 运用结构化的数据分析方法做严谨的质性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9)综述 [J]. *管理世界*, 2020, 36(3): 221-227.
- [56] 凯西·卡麦兹. *建构扎根理论* [M]. 边国英,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the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Social Enterprises

DUAN Hai-xia, GAO Chong-yao, SU Xiao-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Social enterprises are important force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oster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this study chooses Canyou Grou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social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social enterprises are influenced by factors in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forming different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through differentiate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s.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make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start-up stage choose institutional assimilation, forming government and charitable logics. The contradiction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makes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growth stage choose institutional refinement, forming charitable and market logics.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ke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integration stage choose institutional diffusion, forming charitable, market and partnership logics. This study can contribut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Keywords: social enterprise;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 institutional driver;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